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丛书

城·事·人

CITY'S PLANNING ACTIVITIES AND WITNESSES (第一辑)

新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访谈录

INTERVIEWS WITH THE FIRST GENERATION URBAN PLANNING WORKERS OF P. R. CHINA

李浩 访问 / 整理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万列风

靳君达

周平峰

刘学海

从军

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丛书

城·事·人

CITYS, PLANNING ACTIVITIES AND WITNESSES (第一辑)

新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访谈录

INTERVIEWS WITH THE FIRST GENERATION URBAN PLANNING WORKERS OF P. R. CHINA

李浩：访问 / 整理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51478439；51378476；50978236）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事·人：新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访谈录．
第一辑 / 李浩整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6.12

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丛书

ISBN 978-7-112-20258-4

I. ①城… II. ①李… III. ①城市规划—城市史—中国 IV. ①TU98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2873 号

本访谈录是城市规划史研究者访问城市规划老专家的谈话实录，访谈对象以新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为主体，谈话内容围绕“一五”时期的“八大重点城市规划”工作而展开，包含城、事、人等三大类，对 60 多年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其他重要议题也有较广泛的讨论。通过亲历者的口述，生动再现了新中国城市规划工作起源与发展的曲折历程，极具鲜活性、珍贵性、稀缺性及学术价值，是极为难得的专业性口述史作品。

本访谈录按照老专家的年龄由高到低排序，分四辑出版。本书为第一辑，共收录万列风、靳君达、周干峙、刘学海和徐钜洲先生 5 位前辈的 9 次谈话。

责任编辑：李 鸽 毋婷娴

责任校对：焦 乐 李欣慰

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丛书

城·事·人

新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访谈录（第一辑）

李 浩 访问 / 整理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海淀三里河路 9 号）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方舟正佳图文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80×1230 毫米 1/16 印张：15 $\frac{1}{4}$ 字数：321 千字

2017 年 2 月第一版 201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85.00 元

ISBN 978-7-112-20258-4

(2973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序

清代学者龚自珍曾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①。以史为鉴，“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②，“嘉善矜恶，取是舍非”^③，从来都是一种人文精神，也是经世济用的正途要术。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求学时期就曾说过：“读史，是智慧的事”^④。习近平总书记也告诫我们：“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⑤。由于城市工作的复杂性、城市发展的长期性、城市建设的系统性，历史研究对城市规划工作及学科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当我们聚焦于城市规划学科，感受到的却是深深的忧虑。因为一直以来，城市规划的历史与理论研究相当薄弱，远远不能适应当今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当前规划工作联系最为紧密的新中国城市规划史，更是如此。中国虽然拥有历史悠久、类型多样、极为丰富的规划实践，但却长期以西方规划理论为主导话语体系。在此情况下，李浩同志伏案数年、严谨考证而撰著的《八大重点城市规划——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一经出版，立刻在城市规划界引发极大反响。现在，该书的姊妹篇《城·事·人——新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访谈录》（以下简称《访谈录》），也即将面世。作为一名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着浓厚兴趣的城市规划师，我有幸先睹为快，感慨良多，并乐意为之推荐。

历史，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口述为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被奉为中国文化经典的《论语》，就并非孔子所撰写，而是他应答弟子，弟子接闻、转述等的口述作品。与孔

① 出自龚自珍著《定庵续集》。

② 出自贾谊著《过秦论》。

③ 出自司马光著《资治通鉴》。

④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致好友蔡和森等人的书信。

⑤ 2015年8月23日，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

子处于同一时代的一些西方哲学家，如希腊的苏格拉底等，情形也大致相似。目前可知的人类远古文明，大多都是口口相传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说，口述是历史学的最初形态。近些年来，国内外正在迅速兴起口述历史的热潮，但城市规划方面的口述作品，尚较罕见。《访谈录》一书，堪称该领域的一项探索性、开创性的重大成果。

读罢全书，我的突出感受有三个方面。

第一，这是一段鲜为人知，不可不读的历史。数十位新中国第一代城市规划工作者，以娓娓道来的访谈方式，向我们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参与新中国建设并投身城市规划工作的时代背景、工作经历、重要事件、历史人物及其突出贡献等，集中展现了一大批规划前辈的专业回顾与心路历程，揭开了关于新中国城市规划工作起源与初创的许多历史谜团，澄清了大量重要史实。这些林林总总的细节与内情，即便对于我们这些已有30多年工作经历的规划师而言，很多也都是闻所未闻的。《访谈录》极具鲜活性与稀缺性。

第二，这还是一段极富价值，引人深思的历史。与一般口述历史作品截然不同，本书的访谈是由规划史研究者发起的，访谈主题紧扣新中国城市规划史，特别是“八大重点城市”规划工作这一中心议题，访谈内容极具深度与学术价值。关于计划经济时期和借鉴苏联经验条件下的城市规划工作，历来都是学术界认知模糊并多有误解之疑难所在，各位前辈对此问题进行了相当全面的回顾、解读与反思，将有助于更加完整、客观、立体地建构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的认识框架，这是《访谈录》的一大亮点。不仅如此，各位老前辈在谈话中还提出了不少重要的科学命题，或别具一格的视角与认知，这对于深化关于城市规划工作内在本质的认识具有独特科学价值，对于当前我们正在推进的各项规划改革也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第三，这更是一段感人肺腑，乃至催人泪下的历史。老一辈城市规划工作者，大多并非城市规划专业的教育背景，面对国家建设的紧迫需要，响应国家号召，毫无怨言地投身城市规划事业，乃至提前毕业参加工作，在“一穷二白”的时代条件下，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从零起步”，开始城市规划工作的艰难探索。正是他们的辛勤努力和艰苦奋斗，开创了新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基业。然而，在各位前辈实际工作的过程中，他们一腔热血、激情燃烧的奉献与付出，与之回应的却是接连不断的“冷遇”：从1955年的“反浪费”^①，到1957年的“反四过”^②，从1960年的“三年不搞城市规划”，到1964年城市规划研究院^③被撤销，再到1966年城市规划工作全面停滞……一个又一个的沉重打击，足以令人心灰意冷。更有不少前辈自1960年代便经历频繁的下放劳动或工

① 即1955年的“增产节约运动”，重点针对建筑领域，城市规划工作也多有涉及。

② 反对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标准过高、求新过急等“四过”。

③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前身，1954年10月成立时为城市设计院（当时属建筑工程部城市建设总局领导），1963年1月改称“城市规划研究院”。

作调动，有的甚至转行而离开了城市规划行业。当改革开放后城市规划步入繁荣发展的新时期，他们却已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未曾分享有偿收费改革等的“红利”。时至今日，他们成为一个“被遗忘”的特殊群体，并因年事已高等原因而饱受疾病的煎熬，甚至部分前辈已经辞世……这些，更加凸显了这份访谈录的珍贵性、抢救性和唯一性。

可以讲，《访谈录》一书，是我们走近、感知老一辈城市规划工作者奋斗历程的“活史料”，是我们学习、研究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历史的“活化石”，是对当代城市规划工作者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的“活教材”！任何有志于城市规划事业或关心城市工作的人士，都值得加以认真品读。

最后，不能忘记的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聆听各位规划前辈的谈话，得益于邹德慈院士所主持开展的新中国规划史研究，得益于各位老前辈对此项工作的倾力支持。在这里，要衷心感谢各位老前辈！并感谢李浩同志的辛勤访问和认真整理！期待有更多的机构和人士，共同关心或支持城市规划的历史理论研究，积极参与城市规划口述历史工作，推动城市规划学科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杨保军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一日

杨保军，博士，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前言

一、“八大重点城市规划”历史研究的老专家访谈工作

新中国城市规划史最重要特点之一，即当年亲历这些历史活动或事件的当事人许多仍然健在，这使得这段历史研究工作颇为敏感，涉及相关历史人物的论述，必须慎之又慎。另一方面，这也恰恰为史学研究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特别是通过这些历史见证人的陈述，能够弥补纯文献研究之不足，以便解开很多历史的谜团。与古代史或近代史相比，此乃当代史研究工作的鲜明特色之处。

以此认识为基础，在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八大重点城市规划工作进行历史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拜访了一大批数十年前从事城市规划工作的老专家。这项工作的开展，实际上也发挥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老专家的访谈与口述，对有关规划档案与历史文献进行了校核、检验，乃至辨伪；老专家所提供的一些历史照片、工作日记和文件资料等，对规划档案起到了补充和丰富作用；老专家谈话中不乏一些生动有趣的话题，使历史研究不再是枯燥乏味之事。同时，对于城市规划工作过程中所经历的一些波折，一些重要人物的特殊贡献等，只有通过老专家访谈才能深入了解；在一些老专家的谈话中，还逐步澄清一些重要“史实”，或提出一些十分重要的科学命题或研究线索；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历史当事人的参与解读和讨论，通过一系列学术或非学术信息的供给，生动再现出关于城市规划发展的“历史境域”，可以显著增强历史研究者的历史观念或历史意识，有助于对有关历史问题的更深度理解，其实际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因而，通过访谈实践笔者认识到，对于新中国城市规划史研究而言，老专家访谈和口述历史是一项必不可缺的关键工作，它能提供出普通文献档案所不能替代的、第一手的鲜活史料，为历史研究贡献出“二重证据”乃至“多重证据”。所谓老专家访谈和口述历史，当然不是要取代档案研究，而是要与档案研究互动，相互印证，互为支撑，从而推动历史研究走向准确、完整、鲜活与生动。

二、结集出版老专家谈话的动机

对近年来所拜访的各位老专家的谈话进行专门整理并结集出版,是《八大重点城市规划——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以下简称《八大重点城市规划》)^①一书成稿过程中突发奇想的一个“冲动”之举。之所以如此,主要有如下考虑:

首先,在对《八大重点城市规划》研究报告进行修改完善的过程中,尽管已经引用了部分老专家的一些谈话,但由于专家谈话极为丰富、书稿篇幅局限等原因,无法做到较为全面的引用,这就无法充分体现各位老专家精彩谈话的应有价值。而书稿中的一些少量引用,也存在着断章取义、词不达意等弊端。只有完整呈现各位前辈的谈话,才能真正反映老专家的思想或观点。

其次,各位老专家的谈话非常精彩,十分宝贵,是比技术文件或档案更加鲜活、生动的历史素材,对规划档案具有不可替代的弥补、丰富和深化的作用。如果能将各位老专家的谈话结集出版,这将是《八大重点城市规划》的重要补充,是《八大重点城市规划》的姊妹篇。由于其特殊的稀缺性和人文特色等因素,其价值甚至将远在已出版的《八大重点城市规划》一书之上。

再者,就近年来的老专家谈话而言,数十位60年前的亲历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围绕同一主题,展开往事回忆与个人思考,以不同视角、不同立场,共同讲述新中国第一代规划工作者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奋斗史,这本身就是极为难得的一个“奇迹”。如果能将各位前辈的谈话结集出版,必将形成具有开创意义的城市规划口述历史成果,这将对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研究工作的极大推动。

当然,近年来的老专家访谈,属于即兴的口语交谈,在公开出版之前,需要进行大量细致而谨慎的编辑工作,以使其尽可能做到准确、得体,而又不失其真实、生动的特点。为此,在《八大重点城市规划》一书交稿后,笔者即根据访谈时的现场录音,开展了对老专家谈话的专门整理工作。

三、老专家谈话整理的基本原则

对老专家谈话的整理,主要遵循了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如实反映。明确“口述历史”的基本定位,最大限度地如实反映专家访谈的有关内容,保持口语风格与特点,原则上不对谈话内容作大的修改或文字修饰,同时也不对各次谈话进行综述或评论。

^① 李浩著.八大重点城市规划——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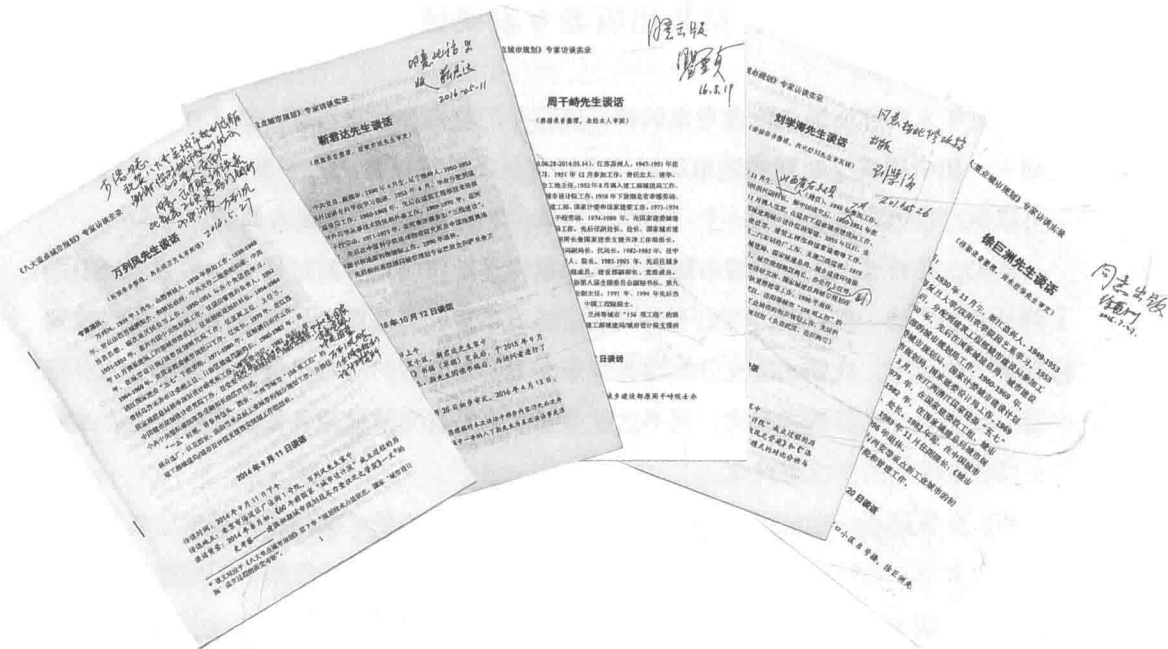


图1 老专家对话文字稿的审阅和授权(部分)

第二,适当编辑。为便于从整体结构上把握访谈的主要内容,适当增加一些概括性的标题,并采用特殊字体予以区别。为便于理解,对某些谈话内容增加一些注释或说明。对于某些口语表述不到位或容易引起误解的谈话内容,进行一些必要的修订。对于某些围绕同一主题的多次谈话,适当加以归并。

第三,斟酌精简。对于谈话中的一些语义重复的内容,适当予以删减。对于某些敏感性问题,或涉及个人隐私等有关内容,适当予以回避(属于不同学术观点或看法的内容,不在此列)。对于与城市规划工作关系不大的某些内容,适当予以删除(属于专家讲述个人经历的,不在此列)。

在谈话的文字稿整理出来后,笔者又专门逐一呈送给各位老专家审阅、修改,最终认可后再请各位前辈予以签名确认(图1)^①。

四、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1. 关于访谈对象

近年来的老专家访谈,主要基于八大重点城市规划历史研究的目的,因而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重点考虑八大重点城市规划活动的实际参与者。由于这一原因,访谈对象

^① 其中,周干峙先生的访谈稿由周干峙先生的夫人瞿雪贞先生审阅并授权出版。

以在规划设计单位工作的老专家居多，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学者相对较少。同时，在访谈工作的后期，逐渐增加了一些虽然未曾参加八大重点城市规划工作，但属同一时代并对有关历史情况相对了解，以及部分年纪相对较轻，但在规划史研究方面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口述与讨论。

访谈对象的职业身份或社会地位，也可能是读者关心的事项之一。现有的一些口述史作品，较多关注杰出人物、重要领导或社会知名人士，这样做自然有其合理性，因为他们大多处于历史舞台的中心，占据着大众并不了解的诸多信息，经历过他人所不曾体会的别样感受。然而，大众同样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同样也会掌握一些颇具价值的信息，他们的视角、认识和体悟，同样是弥足珍贵的，口述历史应当发出并留下他们的声音。基于这一认识，本访谈录全面收录了身份各不相同的诸多老专家的谈话，读者将能聆听到多样化的声音。

由于个人精力所限，近年来拜访的老专家，大都是现居住在北京地区的。在这次整理工作完成后，笔者还计划赴杭州、上海、武汉、深圳等老专家比较集中的地方，抓紧进行持续的补充访谈。此外，港、澳、台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且由于相同的文化根基，其在不同政治制度条件下所积累的城市规划历史经验，较欧美等西方国家更具实际借鉴价值，是中国城市规划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老专家访谈也应考虑到这一因素。最近，借“第二十三届海峡两岸城市发展研讨会”在台湾举行的契机，笔者即提前约请并专门拜访了几位台湾的规划前辈，部分谈话将一并纳入（第四辑）。

2. 关于访谈内容

由于工作性质所决定，近年来的老专家访谈，主要针对“八大重点城市规划”的有关情况。但是，本访谈录的有关内容，却并不局限于八大重点城市规划工作。这是因为，对八大重点城市规划工作的深化理解，需要置身于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历史的整体环境；八大重点城市规划的历史研究，也正是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其为根本目标。

另一方面，访谈录内容也不局限于城市规划工作的专业技术范畴，因为访谈中所谈及老专家本人的一些人生经历、生活逸事或思考感悟等，也是我们全面理解城市规划历史的重要方面，并且是更富人性化的鲜活内容。各位老专家的专业历程，与新中国城市规划事业发展大致同步，通过各位前辈的回忆和口述，向我们呈现了二十多个别样的“规划人生”，这正是书名“城·事·人”的其中一项含义所在。

3. 访谈录的编排

各位老专家的访谈，大多是一对一进行的，个别情况属于两位或多位老专家共同参

与的集体访谈。本访谈录的编排，主要以不同类别的专家访谈为基本单元，按照老专家的年龄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分专辑出版。同一老专家的多次谈话，则以谈话时间先后为序。另外，书中的图片、照片和表格等，按照各个谈话单元分别编号；有关插图大多与正文内容呼应，但也有部分插图是为了阅读调节的需要而编入，与正文内容并不直接相关，特予说明。

截至目前，笔者已拜访过五十余位老专家，其中，访谈相对深入并获得老专家授权出版的，共有近三十位老专家，拟分四辑出版。本书为访谈录的第一辑，共收录万列风、靳君达、周干峙、刘学海和徐钜洲等5位前辈的9次谈话。

4. 专家口述的分歧

读者可能会注意到，在谈及某一历史情况时，不同的老专家所讲述的内容，有时会有一些不一致之处。对此，应从“史实”和“认知”两个方面加以解读。

就认知而言，不同的老专家对某项史实持有各不相同的视角、态度与评价，乃学术观点之不同，属于正常现象。对于这些分歧，不仅不可强求统一，反而应鼓励多样化的争鸣，从而发挥其思辨、启发的功能。

就史实而言，影响老专家谈话的重要方面，即个人记忆的准确性；当然，个人情感或价值倾向等也可能产生某些影响。凡遇此类问题，在谈话稿整理过程中，通过查询相关文献档案资料，作进一步的核实。对于简单问题，直接予以修正，进而呈老专家审阅和确认（有的在访谈过程中即已及时解决）；对于关键性内容，与老专家做进一步沟通后，再做具体处理。除此之外，仍有一些史实，属于文献或档案资料中并无相关记载，笔者也不可妄下论断的情形。对此，只能求同存异，维持各位专家的不同表述。实际上，城市规划历史发展的不少问题，往往也是相当复杂的，并且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不存在唯一性的答案，简单力求统一恐怕也并非明智之举。

五、反思与展望

口述历史的兴起，是当代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口述历史，电视、网络或报刊上纷纷掀起形式多样的口述史热潮，图书出版界也出现了“口述史一枝独秀”的新格局^①。不过，从既有成果来看，较多属于近现代史学、社会学或传媒领域，专业性的口述史仍属少见。本访谈录作为将口述史方法应用于城市规划史研究领域的一项探索，具有专业性口述史的内在属性，并表现出如下两方面的特点：

^① 周新国：《中国大陆口述历史的兴起与发展态势》[J]，《江苏社会科学》，2013(4):189-194。

首先,以大量历史档案的查阅为基础,并与之互动。各位老专家在正式谈话前,大都仔细阅读了“八大重点城市规划”研究报告或有关成果,其中包括大量图文档案信息,这对老专家的回忆起到了重要的提示、触动、启发或联想等帮助作用;有关历史事件、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的相对准确提供,也使老专家的回忆更加准确。同时,各位老专家在正式谈话之前,均进行了较充分的酝酿,不少老专家还准备了谈话提纲或讲稿;在谈话文字稿出来后,老专家又进行了较充分的审阅和修改。另外,对老专家的拜访、谈话录音的整理,以及呈送专家审阅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均由规划史研究人员“亲力亲为”,这种工作方式,除了访谈中的一些疑问之处可以及时提出或查证之外,在谈话稿的整理过程中,也融入了不少史料查阅与研究工作。由于这些因素,本书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一般口述史作品中常见的信息错误,从而提升了口述历史的准确性。

其次,老专家为数众多,且紧紧围绕同一个中心议题谈话。本访谈录所收录的老专家谈话,达数十人次之多,并且均针对八大重点城市规划工作,访谈目的比较明确,谈话内容比较深入。另外,各位老专家早年参与城市规划工作的身份各不相同,有的属于行政干部,有的是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教育背景又不尽相同),有的在给苏联专家当专职翻译,有的则担任过某些重要领导的秘书,他们具体参与规划实践的城市也各不相同。各位老专家以不同视角进行谈话,互为补充,使访谈录在整体上表现出相当的丰满度。而对于某些同样议题,不同的专家或持近似的观点,或有不同的看法,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对城市规划有关科学问题的深入认识也具有开阔思路的特别意义。

有关学者曾经指出:“口述史学能否真正推动史学的革命性进步,取决于口述史的科学性与规模”,如果“口述成果缺乏科学性,无以反映真实的历史,只可当成讲故事;规模不大,无力反映历史的丰富内涵,就达不到为社会史提供丰富材料的目的”^①。若以此标准而论,本访谈录似乎是合格的。但是,究竟能否称得上口述史之佳作,还要由广大读者来评判^②。

① 朱志敏.口述史学能否引发史学革命[J].新视野,2006(1):50-52.

② 毫无疑问,口述历史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就本访谈录而论,相对于访谈现场原汁原味的原始谈话而言,书中的有关内容已经过一系列的整理、遴选和加工处理,因而具有了一定的“口述作品”性质。与之对应,原始的谈话记录及其有关录音、录像文件则可称之为“口述史料”。

然而,如果从专业性口述史工作的更高目标来看,本访谈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史料性的,因为各位老专家对某些相近主题的口述与谈话,仍然是一种比较零散的表现方式,未作进一步的归类解读。目前,笔者关于新中国规划史的研究工作刚开始起步,在后续的研究工作过程中,仍将针对各不相同的研究任务,持续开展相应的口述历史工作。可以设想,在不远的未来,当有关新中国城市规划史各时期、各类型的口述史成果积累到一定丰富程度的时候,也完全可以按照访谈内容的不同,将有关谈话分主题作相对集中的分析、比较、解读和讨论,从而形成另一份风格截然不同的,综述、研究性的“新中国城市规划口述史”。

不难理解，口述历史是一项十分繁琐、复杂的工作，个人的力量实在过于有限，而当代口述史工作又极具其抢救性的色彩；因此，迫切需要有关机构或单位引起高度重视，发挥组织的力量来推动此项事业的蓬勃发展。真诚呼吁并期待更多的有志之士共同参与。

最后，要特别声明，本访谈录以反映老专家本人的观点为基本宗旨，书中凡涉及有关事件、人物或机构的讨论和评价等内容，均不代表老专家或访问者所在单位的立场或观点。

李浩

2016年7月9日，初稿于北京

2016年9月3日，定稿于台北

总目录

第一辑

万列风先生访谈

靳君达先生访谈

周干峙先生访谈

刘学海先生访谈

徐钜洲先生访谈

第二辑

赵瑾、常颖存、张贤利先生访谈

赵瑾先生访谈

赵士修先生访谈

夏宁初先生访谈

高殿珠先生访谈

迟顺芝先生访谈

第三辑

吴纯先生访谈

王伯森、赵淑梅先生访谈

石成球先生访谈

刘德涵先生访谈

邹德慈先生访谈

郭增荣先生访谈

第四辑

- 汪德华先生访谈
- 甘伟林先生访谈
- 辛晚教先生访谈
- 陈为邦先生访谈
- 任致远先生访谈
- 黄世孟先生访谈
- 毛其智先生访谈

目录

序

前言

总目录

万列风先生访谈 / 001

2014年9月11日谈话 / 003

- 一、城市设计院的筹建与工业项目选厂工作的关系 / 003
- 二、八大重点城市规划工作的情况 / 006
- 三、对“反四过”问题的认识 / 006
- 四、几点提问 / 010
- 五、苏联专家对规划工作的指导 / 011
- 六、其他 / 012

2014年9月18日谈话 / 016

- 一、苏联专家指导规划工作情况 / 016
- 二、城市规划工作对苏联经验的借鉴 / 019
- 三、关于“反四过”问题的意见 / 021

2015年11月26日谈话 / 027

- 一、对《八大重点城市规划》（草稿）的几点意见 / 027

二、再论“反四过” / 032

三、提问及其他 / 034

靳君达先生访谈 / 037

2015年10月12日谈话 / 039

一、阅读书稿后的感言 / 039

二、从两则小故事看当时的社会背景状况 / 041

三、给苏联专家当翻译的工作情况 / 042

四、几对俄语名词的译法 / 045

五、“城市规划”一词的定名 / 047

六、关于苏联专家谈话记录 / 050

七、简要的人生历程 / 052

八、对苏联专家巴拉金的回忆 / 056

九、关于刘达容、程应铨和穆欣 / 063

十、苏联专家的意见分歧 / 066

2016年1月7日谈话 / 071

一、与巴拉金合影照片的背景信息 / 073

二、再论“城市规划”的定名及其与“城市设计”、“城市计划”的关系 / 076

三、到苏联参加国际建协年会与巴拉金的一次会面 / 080

四、除八大城市之外，巴拉金对其他一些城市的规划工作的指导情况 / 082

五、关于相机和美女的故事 / 092

六、补充说明 / 094

周干峙先生访谈 / 095

2010年11月7日谈话 / 097

一、“一五”时期的城市规划工作 / 097

二、城市规划工作的起步 / 100

三、从“九六之争”到“反四过”及“三年不搞城市规划” / 103

四、城市规划的科学性 / 107

五、城市规划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 111